

记者再走长征路

革命理想高于天

——解读红军长征壮烈“起步”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至1935年新年的两个多月里，跋山涉水，英勇战斗，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

在寻访红军长征起始阶段的征程中，记者感动于红军壮烈的牺牲故事，感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气概；强烈感受到，红军长征何以取得最后胜利。

顾全大局，不畏牺牲

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队的出发，比中央红军还要早两个月。

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来到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在这里誓师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桂东党史专家罗健东说：“探路的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要讲大局、讲纪律，要有不畏牺牲的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攻势，调动和牵制了敌人11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打乱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的行动。后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县出发，挥师北上长征，后编为红二方面军，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记者在桑植县看到，昔日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已修缮一新。当地各级党员干部，正为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而奋战。县扶贫办主任熊基林说：“我们发扬的，正是红军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神。”

勇于胜利，突破封锁

为围堵中央红军，国民党军在红军前进的路途上重兵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突围后与敌军发生战斗。25岁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献出了生命。他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至27日，红军所有部队渡过桃江，胜利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11日，在湖南汝城县官亨瑶族村延寿河畔，发生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最激烈的战斗之一。88岁的官亨瑶族村老人胡共海回忆：“延寿河的水都被血染红了。”

湖南宜章县是85年前中央红军长征中打下的第一座县城，这里保留着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指挥部旧址。攻打县城前，宜章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便配合红军捣毁了国民党设在县境内的一批碉堡，并帮助红军修战壕、搬炮弹；战斗打响后，又全力照顾红军伤员。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宜章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谢水军表示，紧紧依靠人民，是红军长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法宝。

1934年底，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打响，这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9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拼死突破，表现了无比壮烈的献身精神。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保全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

湘江之战中，担任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湖南道县被俘，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用生命捍卫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强信念。

谢水军深有感触地说：“伟大事业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红军勇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广西灌阳县是陈树湘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灌阳县史志办主任史秋莹认为，红军为什么不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转兵纪念馆外景

■新华社发

怕牺牲？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有必胜信念。“这种英雄气概、坚定信仰激励着今天的我们。”

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见证了红军在严峻生死关头面临的抉择。正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甩掉强敌，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力的主张。

这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认为，“通道转兵”是一项实事求是的决策，“只有真正负起责任，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才能夺取胜利。”

红军进入贵州后，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党史专家认为，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再到遵义会议，构成了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链条。中国革命终于开辟出新的局面。

“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值得我们今天深入学习，大力弘扬，去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征集研究处处长桂新秋说。

(新华社长沙7月3日电)

一款中国创新药的诞生之路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在传统的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和化疗之外，一种新型的癌症治疗方法——肿瘤免疫疗法近年来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国际制药巨头纷纷投入“重兵”，竞逐这一癌症治疗的新赛道。

一家中国科技企业也跻身这场竞赛。它能突破国产药自主创新能力弱的瓶颈，让科技创新惠及更多中国患者吗？

1 “冒险”之路：与国际制药巨头并跑

癌细胞非常狡猾，它会释放虚假信号，“蒙蔽”人体免疫系统，以此躲过后的攻击。一种名为“PD-1”的抗体，不亲自“上阵杀敌”，却能封锁癌细胞的虚假信号，这样一来，人体免疫系统就能自动对抗癌细胞了。

这种新型治疗方法对部分癌症疗效显著。国际制药巨头纷纷上马相关研发项目，位于中国江苏苏州的一家名为“信达生物”的初创企业也加入了这支队伍。2012年，信达生物启动PD-1单抗的产品开发计划，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不是一个“明智”选择。计划最初遭到董事会集体反对：国际巨头才有能力开发最先进的PD-1药物，贸然进军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董事长俞德超博士却坚持这一方向。2011年，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的他回国创业，初心一直未改：一些高端抗癌药在发达国家已经触手可及，可绝大多数中国患者却买不到、买不起，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转变。“做就要做创新药！”俞德超说，中国的生物药已经处于落后局面，我们不可能永远跟着别人跑，虽不能即刻做到领跑，起码应该逐渐跟国外制药企业并跑。

在他的坚持下，计划正式启动。由于其创新特质，很快又获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

2 七年积淀：创下多个“中国第一”

10年10亿美元，是一个生物药从早期研发到商业化平均所需的周期和成本。

“中国现阶段怎么可能做出国际标准的创新药？”在许多人眼里，俞德超的目标“好高骛远”。企业成立之初，他从苏州园区生物纳米园借来一个房间当办公室，站在这头打电话，那头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定制的仪器设备没送到，就找供应商租借现有的样品；办公室小到甚至放不下一个存放试剂的冰箱，就借临近公司的冰箱腾出来的一小块地方……

自主创新能力如同金子，早晚会上发光。信达生物对PD-1的持续攻关，得到了国际制药巨头礼来的青睐，后者提出合作，不过前提条件是建一个超过国际标准的生产基地。这意味着18至36个月的改造时间

和几亿元人民币的追加投入——制药竞争如此激烈，无疑是又一次冒险。

经过深思熟虑，俞德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花重金聘请了美国医药行业最大的咨询公司进行产线改造，甚至不惜搁置已经取得临床批件的一个新药项目，错失了国内第一个上市生物仿制药的机会。

俞德超的底气来自他对创新的自信和耐心。2015年3月和10月，信达生物和礼来两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获得首付款及里程碑款总额超15亿美元，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第一次有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授权给世界500强制药集团，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领域金额最大的国际合作，第一次让中国的原创药卖出了国际价。

当年12月，信达生物提交PD-1单抗的临床试验申请；2017年12月，提交“信迪利单抗”（俗称“达伯舒”）的上市申请，成为首个申报上市的国产PD-1抗体；2018年12月，该新药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

3 不忘初心：大幅降低患者经济负担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多发于中青年，尽管传统治疗不断提高治愈率，仍有15%至20%为复发或难治的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信迪利单抗的上市有望改善这一情况。

新药在临床试验阶段就备受中外肿瘤专家的关注。2019年初，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团队牵头开展的信迪利单抗二期临床研究登上《柳叶刀·血液学》的封面。研究结果显示：该药治疗复发难治霍奇金淋巴瘤的客观缓解率高达80.4%，副作用小，其疗效和安全性与同类进口药物不相上下。

与同类进口药物相比，中国原创药的价格仅不到一半。再通过与各方合作探索支付方式的创新，患者年治疗费用约为美国同类患者的1/6，大幅减轻了经济负担。

这家中国科技企业的原创新药攻关还在继续。今年6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了其与礼来共同开发的在研药物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的上市申请，有望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患者提供高质量替代药物。

“医药事业是创新事业，更是惠民事业，希望信达生物用好创新杠杆，在提升创新药可及性上实现更大突破。”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对其未来发展提出新期盼。

“我们将不负使命，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创新药，让更多老百姓用得起优质创新药。”信达生物首席运营官周勤伟博士说。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